

哲学史

14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

作者：惠顿学院的亚瑟·霍姆斯博士

我们首先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各个领域都是目的论的。也就是说，存在某些自然目的，代表着我们所讨论的一切事物的恰当运作方式。因此，为了发展一套伦理学，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就是探讨人的灵魂及其恰当的功能。

这涉及到区分不同的功能，例如他所谓的植物性灵魂的营养功能、动物性灵魂的感官功能（意识和感觉）、以及理性灵魂的理性功能——理性灵魂当然是区分人类与其他物种的关键所在。因此，根据他的目的论，善就是恰当的运作，或者如他所说，就是符合理性的完整人生。与之相对的是，也符合美德。

因为美德其实就是正常运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现象，但当别人问我过得怎么样时，我会说：“挺好的，一切正常。”然后他们会说：“嗯，我想这算是个好的开始吧。”

或者，就这些？对此，我的回答是，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这非常好。运转正常。你试试看。

关键在于，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定义的那样，美德其实就是良好的运作。正确的运作。符合内在目的论，即最终原因的运作。

你看，我们所谓要实现的，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潜能。也就是说，要过一种符合理性、完整的人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德的概念其实很简单。

希腊语中表示美德的词是“*arête*”，它的含义比我们今天所说的“美德”更广泛，或许也更宽泛。“*arête*”可以简单地指卓越或品质。因此，一个有德之人就是一个具备某种人性品质的人。

你看，这就是人性。一生都按照人性的独特方式度过。这就是生命的人文特质。

作为一个人，就应该如此行事。卓越。因此，请记住，美德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包括外在行为和内在品格。

动机。意图。态度。

事实上，谈到美德，通常的做法是把美德理解为道德倾向。倾向是指使你倾向于某些行为的因素。明白了吗？所以，是内在的内在运作使人倾向于恰当的外在行为。

换句话说，品德高尚的人是内心驱动的，而不是仅仅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内心驱动。发自内心。

新约中的措辞。内在导向。那么问题就立刻出现了：如果这是正常运作，我们如何获得正常运作？我们如何才能真正发挥这种作为人类的运作能力？我们拥有这种能力，这种潜能。

它将如何实现？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强调习惯及其养成的原因。因为一种稳定的性情，正如最近一本书所说的，是一种“心之习惯”。你看，就是“心之习惯”。

那么，如何培养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呢？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当亚里士多德探讨这个问题时，他指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发展。道德发展理论领域正在进行大量的研究。

如果谈论的是性格发展，那很可能要借鉴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发展的论述，因为性格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美德以某种方式统一起来的结果。明白了吗？嗯，就是一系列美德或恶习。当然，这是良好性格与美德之间的对比。

那么，习惯的养成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一种完全按照理性生活的方式，那么它必然是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的养成又必须受到理性的引导。否则，它就无法成为一种符合美德的性情。所以，他所谈论的，基本上就是需要深思熟虑和选择。

决策。也就是说，无论以何种方式，当需要做出决定时，当有两种或多种选择时，我该怎么做？对目标的深思熟虑，告诉我们什么是良好的运作。对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深思熟虑。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然而，做一次并不能养成习惯。正如他说，一只麻雀不能代表整个夏天。

一天也做不到。不，你需要的是反复的决定，反复的选择，反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一遍又一遍，直到它成为一种思维习惯。正是反复的思考和深思熟虑的行动，才使之成为习惯。

现在，你会反思自己养成的一些习惯。比如，开车时，驾驶已经成为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但它是如何变成无意识的习惯的呢？因为你思考过为了汽车的正常运转应该做什么，并决定去做。

你看，无论是身体习惯、心理习惯，还是培养自律的思维方式，都是如此。记住最终目标、达成目标的手段，然后做出决定，并据此行动。这就是习惯养成。

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有些人会在这方面遇到困难。因为养成这种习惯需要自律，或者说，需要自制力，需要节制的美德。

如果你原本就没有节制，又该如何获得节制呢？而获得节制本身就需要节制。你看，这就是个循环论证的问题。他们患有他所谓的意志薄弱症（akrasia）。他们缺乏坚持到底的毅力，缺乏内在的决心，无法做出决定并坚持下去。

意志薄弱。所以，对于那些无法理性约束自己的人，比如幼童以及他所说的那些天生就应该做奴隶的人，他们就必须受制于他人的理性。在儿童教育中，良好的习惯只需通过纪律就能培养出来。

飞马来比喻的问题吗？那就是如何控制那些无法控制的欲望、任性的冲动和激情。它们必须受到理性的约束。

如果个人不够理性，无法受自身理性支配，比如像那些受欲望驱使的工匠阶层，那么他们就必须受他人支配。从这个角度来看，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非常接近。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审议过程如何进行。

这种深思熟虑能够引导怎样的过程？这种深思熟虑旨在寻求极端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如果美德是人类灵魂或人格某个方面的恰当运作，那么某种特定的人格特征或性格特质可能过犹不及，失去平衡；也可能不足。因此，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既不过度也不不足，而是达到中庸之道、理性平衡的生活品质。

所以，深思熟虑的作用在于找到平衡。现在，如果你再看看他对灵魂的看法以及灵魂运作的方式，你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了。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植物性灵魂，植物性生命，那么，其基本功能就是营养和繁殖。

而从这些方面来说，良好的机能最终会带来身体健康。明白吗？身体健康就是好事。另一方面，还有动物性的灵魂。

在这方面，他尤其关注感觉和感官功能，也就是意识层面的感觉、情绪和欲望。他认为，正是这些功能的正常运作，才能产生他所谓的道德美德。

道德美德是指欲望、情欲和情感达到平衡的状态。当然，也包括理性灵魂，它拥有思考、言语和艺术等功能。

这里，你想要的正确函数是 智力美德。智力的美德。在这些智力美德中，他区分了两种。

一种是实践理性。不，应该说是实践智慧。另一种是沉思智慧。

好吗？先说说实际的理性，再说说深思熟虑的智慧。现在，说说感性的生活。情感，欲望。

这些感受可能过强，也可能过弱。过犹不及。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在合适的时间，针对合适的对象，以合适的动机，用合适的方式，去感受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渴望的一切。

你看，这就是平衡。而这正是你在深思熟虑中要追求的。例如，在合适的时间，针对合适的对象，对合适的人，出于合适的动机，以合适的方式，感受到愤怒。

好吗？感到饥饿。感到饥饿。感到饥饿。

在合适的时机受其驱使，如此往复，如此循环往复。因此，这就变成了监控、引导和控制情感生活的问题。道德美德。

而且，当你阅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你会注意到他谈到的各种美德。例如，勇气这种美德，过度的勇气就是鲁莽，不足的勇气就是懦弱。

慷慨是一种美德，也就是对人乐于助人的态度。它的缺点就是吝啬、小气。

过度、挥霍、不加节制地花钱。明白吗？所以，从正常运作的角度来看，介于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就是保持情感生活的适当平衡。好吗？记住，早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关于什么是理性、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事物应有的秩序，总是基于平衡和比例的。

道德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有几处谈到了这个问题。

他明确指出，快乐和幸福并不相同。幸福当然是指身心健康、运转良好。而快乐更像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会过度，也可能在错误的时间对错误的事情感到不适，等等。

快乐的问题在于它的间歇性，它取决于外部事件，而这些事件很大程度上不受我们控制。快乐有很多种，它们的道德价值也各不相同。因此，如果我们用其他标准来衡量快乐，如果快乐的道德价值各不相同，那么快乐就不能算是至善。

毕竟，外出消遣有其乐趣，阅读亚里士多德也有其乐趣。两件事的道德价值各不相同，等等。不，实际上，他的道德心理学是，快乐并非追求的目的，而更像是副产品，是实现某些其他目的的附带结果。

你可能太执着于琢磨那顿美味佳肴是否物有所值，以至于吃完后反而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享受其中。真正的乐趣在于享受过程本身，而非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目的。这是一种额外的收获。

必须关注的另外两点就与政府取代艺术的功能有关。因为柏拉图认为这两者都有助于灵魂的提升。亚里士多德也持相同观点。

事实上，这贯穿了整个政治理论，直至马基雅维利等人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政府的职能与善有关，而非与权力有关。因此，亚里士多德从人类的终极目标（telos）的角度看待政府，他将人定义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更是社会的存在。

他说，我们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而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一个短语，“天生如此”。在希腊语中，它只是一个词“fousai”，一个词，意思是“天生如此”。

当然，他的所有论述都充满了目的论的意义。你看，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其最终原因、目的、终点。这是由其本性、本质和形式决定的。

人类天生就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性是我们存在的根本。只有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才能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我们脱离社会就无法正常运作。你看，亚里士多德永远也写不出《鲁滨逊漂流记》。丹尼尔·笛福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是18世纪个人主义时代的社会哲学家。你读读关于笛福的评论文章，就会发现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笛福笔下描绘的是一个自给自足、理性的人，独自生活在他的岛上，只有山羊和他的神。

当然，他驯化了山羊，让它们服从理性，就像动物本来就应该的那样。当野蛮人来享用他们的食人盛宴时，他当然不会与他们有任何瓜葛。事实上，他救了曼弗雷迪，并且严加看管他，直到他足够理性，他们能够达成社会契约。

西班牙水手来了。他们不够理智。他不信任他们。

英国水手来了，社会契约也随之而来，他们航行的方式也逐渐走向更加社会化的生活。但亚里士多德绝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论断，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与世隔绝、独自生活在岛上的个体，其实也是社会性的存在。他们是相互依存的社会

性存在，人类的福祉只有在社会正常运转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而不仅仅是依靠个人。

那么，鉴于此，他试图构建一个理想国家的概念，我们可以预见，理想国家是一个运转良好的国家。运转良好是指符合国家性质及其既定目标。换句话说，什么是公正的社会？什么是公正的社会？公正的社会是指为了公共利益而理性有序的社会。

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理性安排的。没错。什么是公正、善良的人？就是那些情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人。

我的意思是，为了他好，为了大家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是放大的个人。它必须为了公共利益而得到妥善管理，而这一点上，它与柏拉图的相似之处就开始逐渐消失了。

因为你还记得柏拉图曾否定了当时存在的各种政体形式，认为它们不合适、不公正且不稳定。贵族制、民主制、僭主制、寡头制，无一行得通。因此，他设立了一种也是唯一一种政治理想，即由哲人王统治。

现在，我怀疑这是因为柏拉图的理想只存在于柏拉图理念论的超越性天堂中。而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理念只存在于具体事物的世界中。具体事物不完美地实现了理念。

所以，理想国的实现方式可能多种多样，各有各的不足之处。你明白吗？所以，亚里士多德对其他政治体制持开放态度。对其他类型的事物也持开放态度。

他并不关心公正社会的理想结构是什么。他更关注的是任何社会、家庭、教育、经济制度（比如他那个时代的奴隶制和交换制度等等）的正常运转。他所关注的正常运转，是指符合公共利益的运转。

鉴于他认为的善是符合理性的完整人生，他所推崇的教育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符合理性的完整人生的博雅教育。你看，它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非常清晰透彻。

在我看来，我们国家很多关于政治的思考方式更接近柏拉图式而非亚里士多德式，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只有一种公正的社会形式，那就是像美国那样的社会，而不是认识到可能存在多种可行的替代方案。那么，艺术呢？艺术呢？在这里，我们最初与柏拉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因为他把艺术描述为一种模仿。但相似之处也仅限于此。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应当模仿形式，即超越的形式。因此，模仿具体事物、个人，甚至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的艺术，都与现实相去甚远，因为个人仅仅是其自身，是形式的复制品。但就亚里士多德而言，艺术并非模仿形式，而是模仿生活，或者如人们常说的（为了与柏拉图区分开来，这个说法很贴切），艺术是再现性的，没错，但它再现的是生活、人物及其情感。

想象一下模仿他们的情感，表现他们的情感。这正是柏拉图在公开朗诵和吟诵时所警告的，即不要模仿他人的情感。你明白吗？是对人物、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行为的再现，因为你只能在特殊之中看到普遍性，明白吗？所以艺术帮助你聚焦于这些累积的经验，让你对一个被出色地刻画的人物说：是的，我们不都这样吗？我们不都这样吗？明白吗？因为优秀艺术的精髓在于它帮助你在特殊之中看到普遍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诗歌——一种艺术形式——比历史更具科学性。这或许会让你觉得奇怪，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这样想，但在他那个时代，他认为历史仅仅是叙述细节、编年史，仅此而已，讲述故事；而诗歌，因为它捕捉到了某种普遍性的东西，所以更接近他所谓的科学，即理论思考，即运用普遍原则进行思考。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批评，即对艺术形式的批判，以及艺术批评的标准，都是基于这种理念而运作的。

这与情感表现对观众的影响有关。例如，在谈到戏剧时，他列举了优秀戏剧应具备的形式特征，但他更关注的是情感冲击力。一部好的悲剧必须能够带来情感宣泄，尤其是恐惧和怜悯这些很容易失衡、夺走我们勇气的情感。

是的，先生。净化（Catharsis）是一种情感的洗涤，因此，在一部优秀的悲剧中，怜悯和恐惧会被唤起，这些情感会在悲剧的结局中得到释放，情感生活仿佛被净化，我们因此能够暂时摆脱这些情感的束缚，过上更加理性的生活。理想与艺术的关系，当然不如柏拉图那样侧重于对美本身的沉思。

那么，我希望你能从政治理论和艺术中看到，他的潜在形而上学是如何产生这些结果的。你还记得我们之前用柏拉图做过的那个图表吗？先搞清楚形而上学，认识论当然是它的推论。但是，你如何认知取决于你所认知的是什么，你看，政治思想、美学、伦理学、教育理论以及其他一切都往往由此而来，亚里士多德就是另一个经典的例子。

好了，这就是我想说的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现在轮到你了，大卫。对亚里士多德来说，知道什么是善并不等同于行善，因为你的意志远大于选择。

是的，我觉得没错。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不意味着你就会自动去做。你必须做出选择。

亚里士多德更强调选择的自由。你说知善并不保证行善，而很多作者却认为，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来说，知善就意味着能够行善。没错，苏格拉底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我认为这并非全部真相，所以即使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言，这种说法也并非完全正确。

我这么说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你读柏拉图的《理想国》，当然，你肯定会在某个雨天读的，对吧？当你读到柏拉图的《理想国》时，你会发现他是在谈论如何培养人们以理性治国，培养哲人王，培养那些以理性治国的智者。

原来，知识是有道德前提的。那么，如果认知有道德前提，认知又如何能使行善成为可能呢？你明白了吗？只有当你学会自制、获得勇气之后，你才能学习辩证法，而辩证法对于认识永恒真理至关重要。所以，认知是有情感和道德前提的。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善，你就会自动行善呢？如果你认真对待斐德罗神话，答案就不是这样了。你可能正驾着战车锯阁楼，但那匹桀骜不驯的马可能会弄翻整个装置，让你功亏一篑。你看，这样你就无法行善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把柏拉图式的整体思路考虑进去，这并非自动发生。如果人们知道什么是善，他们就会去做。哦，还有另一层含义，那就是柏拉图并非在谈论一种超脱于世俗、价值中立的知识。

他谈的是热爱真理，记得吗？或许，如果你真的热爱真理，你就会去做它要求你做的事。他们所说的“知晓”并非那种超脱、客观、不带个人色彩的认知。那么，亚里士多德又如何呢？在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我通常倾向于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对柏拉图思想的延伸和改进，但在道德和伦理方面，他似乎失去了柏拉图那种超越性的道德准则，因为他似乎把所有超越性的部分都实用化了，神秘的层面缺失了，而这在道德中似乎至关重要。

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嗯，好吧，我姑且接受你的观点，毕竟是我先提出的，柏拉图的伦理学确实激发了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但我并不认同实用主义。你看，实用主义的定义本身就取决于创造这个词的人的信念。

尤其是约翰·杜威。实用主义认为，道德信念和价值观仅仅是实现暂时目标的工具。对实用主义而言，这些目标永远是短期的。

我们追求的，与其说是某种东西，不如说是某种整体的善。杜威坚持认为，不存在内在的善。一切都是工具性的。

然而，这并非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内在的善。你看，作为一个人，正常地履行职责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的善。

你看，他关于至善、最高善的观念首先是它必须是内在的善，而不仅仅是工具性的，而杜威对此完全不认同。那么，我怀疑，你提出实用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对立，实际上是在问，就内在形式而言，他是否存在任何真正普遍的理想？你看，那些不这么认为的人是实用主义者。亚里士多德不是实用主义者，但他是否存在任何普遍的理想呢？是的，他有。

你不必成为柏拉图主义者才能成为伦理绝对主义者。你看，绝对的善，就是按照理性、按照美德过一种完整的生活。你看，美德本身就是善。

你应该追求美德。他对此毫不含糊。为什么？因为即使形式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形式本身仍然是普遍原则。

你看，拥有普遍性并不需要超越性的普遍性。你看，相对性的反面就是普遍性。你看，亚里士多德就明白这一点。

如果你的意思是，哦，但他并没有给我们一整套绝对的准则来遵循。不，但他给了我们一些绝对的德行来践行，你看，因为他的伦理是德行伦理，而伦理理论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罗列绝对准则的做法。你看，人们认识到，虽然存在普遍的道德理想，并且由此可以推导出一些规则，但如果一种伦理是目的论伦理，那么它首先必须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坦白说，我认为这就是圣经伦理的精髓所在。我认为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你看，圣经道德将效法基督视为最终目标。

你说，是啊，但是十诫呢？没错，但其精髓在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看，这就是十诫的真谛。

他们只是在阐述爱在完整人生中的真正含义。这意味着你要在各种道德责任领域追求神的旨意。也就是说，有些事你不会去做。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亚里士多德不是实用主义者。不。他有超越性的存在吗？是的，他就是上帝。

因此，善最终与上帝本身所维系、所维护的那种有序的统一性息息相关。我之前没提到，或许我应该提一下，当他谈到默观的智慧时，最高的默观就是默观那不断默观自身默观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就是默观上帝。

所以，他带有柏拉图式的色彩，但并没有像后来的神秘主义那样走向超凡脱俗的方向——柏拉图没有，但后来的神秘主义却走向了。这样说你明白吗？你再深入探讨一下吗？哦，嗯，可能不想。我有时发现，在入门课程中，比如我们只用一天时间讲解亚里士多德，入门学生经常会说，哦，亚里士多德是相对主义者。

你看，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呢？因为他谈到的是找到中庸之道，而不是精确地指出你应该做什么。你看，但说找到中庸之道，其实就是精确地指出你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就是运用上帝赐予你的天赋，并结合你所掌握的所有信息，做出你自己的决定。